

“中庸”和“反中庸”是两条根本对立的 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校 大 批 判 組

自从孔老二发明了“中庸之道”，历代的反动派都奉为至宝，企图用它来反对社会变革，扼杀新生事物，镇压人民革命，抵抗历史前进运动的辩证法。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也毫不例外。他们一直高举“中庸之道”的黑旗，狂热鼓吹“中庸之道……合理”，声称他们奉行的所谓“正确路线”就是“中庸”路线，他们信仰的所谓“辩证哲学”就是“中庸”哲学。真是什么根长什么藤，什么藤结什么瓜。两千多年，一条黑线，把孔老二和林彪一类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反革命小丑紧紧地串在一起。这便于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撕开他们的画皮，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中庸之道”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

林彪口授死党在黑笔记本记下：“中庸之道……合理”；并以骗子讲哲学的丑态，在他的《辞海》“中庸”一条上批了又批，宣称他所奉行的所谓既反“极左”、又反“右倾”的“正确路线”，是以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理论根据的。这一记一批，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阴谋用“儒家的原理”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妄图用反动阶级的政治策略来对抗党的基本路线。

“中庸之道”，是孔老二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激烈变革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奴隶、平民的革命起义和新兴封建势力的变法斗争，正在猛烈地冲击和瓦解着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暴风雨，给奴隶制的灭亡敲起了丧钟。面对着新、旧势力激烈搏斗中出现的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死心踏地想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孔老二，却惶惶不可终日。对于奴隶制旧秩序的“礼制”日益被革命力量所破坏，他感到痛心疾首，狂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眼见奴隶们在不断觉醒，“天命”、“大人”、“圣人之言”这些宗教上政治上思想上的旧权威都已压不住台了，他又感到必须警惕“小不忍则乱大谋”。因而，他一方面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个“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开倒车、搞复辟的具体计划；另一方面，他总结以往奴隶主的统治经验，苦心炮制了一套“中庸之道”的政治策略，即妄图用调和矛盾的骗术，来抹煞阶级斗争，抵制社会革命，藉以维护旧制度、旧秩序。这一套“中庸之道”，被孔老二看作是实现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的主要策略手段。

孔老二宣称：“中庸，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的原则，算是最高的了！”（“中庸之为德

也，其至矣夫！”《论语·雍也》）。这个原则，要求统治者善于掌握住“中”（“允执厥中。”《论语·尧曰》）；所谓善于掌握住“中”，即是采取一种承认矛盾但不走极端的调和态度来对付矛盾，用这一手来欺骗和麻痹人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根据这个策略原则，孔老二还想出一套“使民服”的办法，诸如：统治者要善于施点小恩小惠而不必花过多的钱，要善于使奴隶多多劳动而又不产生怨恨，要满足剥削欲望但不过于贪婪，要摆出高贵神气但不显得骄横，要用镇压的权威但不要过于猛烈（“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以及“德、刑”要并用，“宽、猛”要相济，即把镇压和欺骗两手很好结合起来，……等等。孔老二炮制的这套“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策略，有着明确的政治标准和政治目的，即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礼”。他认为，任何言行都要“节之以礼”、“约之以礼”、“齐之以礼”，即按“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办事，这就叫“中”；如果超越了“周礼”规定的限度或达不到这个限度，都一样，“过犹不及”，都违反了“中”的原则。“礼”就是“中”的最高标准。“执两用中”就可以达到“复礼”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礼”的作用，首要在于调和矛盾；过去奴隶主的统治，就把矛盾调和得很美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可见，所谓“中庸之道”，作为调和矛盾的策略手段，完全是为“克己复礼”即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

鲁迅先生曾深刻揭露：“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南腔北调集》）孔老二也承认这一点。他哀叹：中庸是个最高的政治道德原则，可是广大劳动人民早就不实行、不卖账了。（《论语·雍也》）孔老二的接班人孔伋（子思）更明白地供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这就从反面说出了一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君子”讲中庸，“小人”就反中庸；而且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的“小人”，很能识破“中庸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愈反愈“无忌惮”。所以敢于起来斗争，起来造反，起来革命。不是吗？在奴隶群众中“名声若日月”的柳下跖，就敢于大反“中庸”，发动和组织了近万名奴隶起义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大造奴隶制的反。孔老二曾打起“中庸之道”的黑旗想去骗取柳下跖“罢兵休卒”，“共祭祖先”，放弃斗争；遭到柳下跖严词痛斥，给他戴上了一顶“盗丘”的帽子，至今无法取下（《庄子·盗跖》）。“反中庸”，是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是觉悟了的“小人”所必然遵循的革命路线。孔老二的中庸策略，正是想方设法对付这条革命路线的。对付的方法有二：一是骗，二是杀。骗不了就杀，杀了后再骗。当时，郑国奴隶大暴动，大反“中庸”，肆无忌惮，郑国奴隶主对这批起义奴隶实行了杀光政策，孔老二为此拍手欢呼：“杀得好”！就要这样实行“中庸之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左传》昭公二十年）鲁国少正卯鼓吹革新，违反“中庸”，孔老二迫不及待，抓来杀掉，暴尸三天，声称：“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事实表明，孔老二的“中庸”策略，对“小人反中庸”是深恶痛绝的，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中庸之道”，只适合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革命人民的极其凶狠的反革命策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具体表现了两个互相对抗的阶级、两条互相对立的政治路线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林彪一伙所谓“中庸之道……合理”，究竟合哪个阶级的理，不是十分清楚了么！历代

反动派坚持剥削压迫“有理”，认为“吃人”的剥削制度不可改变，因而必然要以调和矛盾的“中庸之道”来否定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否认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便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林彪所说的“合理”，只能合反动剥削阶级代代相传的这个“剥削压迫有理”的“理”。劳动人民在斗争中觉醒，坚信革命造反最有理，所以必然反对中庸之道，并且愈反中庸，愈能认识到革命的真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打翻在地，把人类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中庸和反中庸，就是这样针锋相对的两个传统、两条路线、两种策略。林彪一伙自己供认他们所奉行的路线，是以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的，这就充分表明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的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是与历史上反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黑暗的思想传统联结在一起的。

“中庸之道”是对革命辩证法的反动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是两条针锋相对的思想路线。林彪一伙妄图用“儒家的原理”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公然胡诌什么“过犹不及”是“辩证观念”，“中庸之道”“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等等，企图用形而上学的均衡论和折衷主义来篡改和冒充革命的辩证法，其手段十分拙劣，其用心则极为险恶。

中庸之道，作为哲学形态，孔老二当初抛出时还比较粗陋。他提出“中庸”的思想原则，主张所谓“执两用中”，“中立不倚”，“无过无不及”，“君子无所争”等，无非是想把事物的对立“两端”，说成是可以而且应该永远保持和谐和统一，否认事物会在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从而幻想奴隶制度永世长存。经过长期封建社会，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董仲舒到朱熹之流，对中庸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一再进行了理论加工。他们谎话连篇，说去说来，无非是玩弄两套诡辩：（一）是把事物的常住性加以绝对化，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即现存社会制度及一切事物，是一成不变的，至多只有量的增减，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强调只许守旧，不能革新。（二）是把矛盾的同一性加以凝固化，认为“凡物皆有对”，但对立的尊卑上下、君臣父子等，却“定位不易”，即现存社会矛盾及矛盾双方的地位，是不能转化的；强调对于矛盾只能调和、融合、保持和谐和统一，不能展开斗争；因而反对“偏激”、“过分”……等等。朱熹等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士，干脆把“中庸”解释为“中和”，并玩弄拆字的把戏，给“中庸”下了个定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胡说什么不偏不倚，调和矛盾（“中”）是“天下之正道”；墨守常规，坚持不变（“庸”）是“天下之定理”。显而易见，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是对辩证法思想的反动。

“有比较才能鉴别”。与孔老二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早已提出过事物是在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史墨提出“物生有两”的观点，并用以论证新兴封建势力对腐朽奴隶主势力的反叛和斗争，造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大变革，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稍后，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更论证了社会新、旧势力的矛盾，是“不可同世而立”，是“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难一》）；旧势力不会自动垮台，只有通过“疾风”“大雨”式的激烈斗争，新势力才能战胜和摧毁旧势力（《韩非子·亡征》）。对比史墨、韩非的这些可取的思想萌芽，更显示出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的腐朽反动，从来就是历史上的思想糟粕。林彪一伙搬出这样的反动糟粕来对抗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足见其“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被林彪一伙用来冒充“辩证哲学”的中庸之道，正好是反辩证法的“不变”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彻底科学地阐明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新的方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战胜旧的方面而使旧事物变为新事物。这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所以说“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矛盾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这个普遍规律，如实地阐明了新生事物不断战胜旧的腐朽事物的必然趋势。它指导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满怀信心地去从事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实现着社会发展的革命飞跃。

而林彪一伙所信奉的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却正好与辩证法思想针锋相对。它代表了没落阶级的反动要求，妄图抵抗历史规律，死抱住行将灭亡的旧制度、旧事物不放。孔老二就顽固地坚持“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奴隶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因而，仇视一切新生事物，认为新事物战胜和代替旧事物是不可的。中庸之道也有它寄生的认识根源。首先，事物的发展在量变阶段往往表现为旧质的相对稳定性，中庸之道把这种相对稳定性夸大为绝对的，宣扬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只许改良，不能革命。其次，事物发展过程中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具有曲折性，社会生活中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革新和保守、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往往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河流。中庸之道抓住这一现象当作稻草，拼命鼓吹倒退是必要的，复辟是可能的，“仍旧贯，何必改作”（《论语·先进》）。总之，中庸之道就这样夸大事物的常住性，否认事物的转化，藉以反对革新和进步，宣传保守和倒退，为垂死的反动阶级打强心针。正如毛主席所批判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

中庸之道既然否认了事物的转化，也就是否认了促成事物转化的矛盾斗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一切事物中，矛盾双方联结为统一体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统一体的存在要靠斗争来维持，统一体的破裂要靠斗争来实现，新的统一体的形成要靠斗争来创造。斗争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另一过程转化。没有矛盾的斗争，就没有世界，没有发展，没有生命，没有一切。人类社会也是在不断地一分为二，在不断的斗争中前进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而林彪一伙所宣扬的孔孟儒家的中庸之道，却恰与此相反。他们在中庸的“中”字上大做文章，什么“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兼中和之义”等等，实质就是调和矛盾，反对斗争，尤其反对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阶级斗争。在当时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孔老二还特别强调“和”，一方面是要用“孝悌”“忠恕”等加强奴隶主阶级的内部团结。另一方面，是要新兴地主阶级“温良恭俭让”，要奴隶们“贫而无怨”，“贫而乐”，

服服贴贴服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不许反抗，不许斗争。幻想用调和矛盾的骗术，来扑灭革命斗争的烈火。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十分显然。这种调和矛盾，否认斗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也有它寄生的认识根源，即似乎看到了矛盾的同一性，但把矛盾的同一性绝对化，把相对的同一性夸大为绝对的，从而否认了矛盾的发展不平衡性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这是形而上学的均衡论和折衷主义向革命的辩证法进攻的主要手法。

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林彪一伙妄图用中庸之道来冒充辩证法，正说明他们的确是孔孟儒家的最忠实的信徒，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耻的叛徒。

中庸之道与林彪的反革命阴谋

鲁迅先生曾经揭露口讲中庸的折衷主义者的丑恶嘴脸：“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当，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灵魂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华盖集》）林彪一伙骗子，正是这样。他们打起孔老二的中庸之道的黑旗，口称既要反“极左”，又要反“右倾”，实际上是继承了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策略，炮制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疯狂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我党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修斗争，疯狂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篡改党的理论基础，便于他们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篡权复辟，实现他们对内联合地富反坏右，对外投降苏修新沙皇，把我国人民重新打入半殖民地旧社会黑暗地狱的反革命阴谋。

经过五七年整风反右，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迅速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革命高潮。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三面红旗鼓舞着七亿人民，突破旧的平衡，打破旧的常规，大大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巩固了城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敌人妄图在我国搞“和平演变”的颠覆阴谋。在革命大跃进中，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一切腐朽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和革命智慧得到空前发扬。全中国一片热气腾腾。列宁曾经讲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革命的秩序，是最正常的秩序。而林彪这只怕看阳光的蝙蝠，却躲在阴暗角落里，捡起了孔老二的中庸之道的破烂武器，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了、“过极”了，并疯狂咒骂“过分则转化”，“过极则相反”。更有甚者，他还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极左”、“互相残杀”，咒骂无产阶级革命派英勇地向一小撮走资派展开斗争是什么“右派势力抬头”，叫嚣要“坚决镇压”。林彪这一片狂吠，我们并不生疏。1927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刻，一伙反革命的右派势力就疯狂叫嚣过“太过分了”、“矫枉过正了”，“糟得很”，并且恶毒咒骂革命先锋的贫农是“痞子”。当时，毛主席就严词批驳了这种用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等来反对革命的谬论。毛主席指出：“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并且明确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事实上，林彪攻击三面红旗“过分”、“过极”，是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他狂叫什么“过集”（即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即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他的目的是妄图砍掉三面红旗，调动地富反坏右的积极性，以实现其变天、复辟的反革命阴谋。他攻击文化大革命，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新生事物，同样是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复辟阴谋。

六十年代的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苏修叛徒集团勾结国际反动派猖狂反华、反共、反革命。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对苏修一系列挑衅，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了他们的进攻，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使苏修头目赫鲁晓夫这个白骨精，在我们“九评”之后而现了原形。正当这时，林彪这个“超级间谍”，这条苏修的哈巴狗，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妄图替苏修打掩护，吹起中庸之道的法螺，恶毒咒骂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骂绝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击“做绝了”，并恐吓说：“绝则错”“必有恶果”。好一副叛徒加汉奸的嘴脸！除了咒骂和恐吓以外，林彪还把孔老二“戒之在斗”、“和为贵”等发展为“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有意模糊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要我们放弃原则，放弃斗争，与国内外阶级敌人讲“和”称“友”，企图用中庸之道的绳索来捆住革命人民的手足，把中国拱手让给苏修，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让他当起新沙皇“核保护伞”下的几皇帝。林彪“把自己的灵魂枭首通衢”，使人们清楚地看出，他贩卖的中庸之道，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卖国贼的哲学。

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在揭露苏修叛徒集团及其“三和两全”的形而上学谬论的斗争中，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更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揭示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辩证法，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林彪对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恨之入骨。他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一样，很懂得理论上挖心战术的重要，因而心劳日拙地捧出腐烂发臭的孔孟之道来，作为他的进攻武器。由于两种社会制度交替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环境具有某种共性，孔老二当年妄图用来调和矛盾、扑灭斗争、阻止社会变革的中庸之道，被他看作是反革命的传家宝。他直接把中庸之道作为他的反革命路线和反革命策略的理论支柱，放肆地攻击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 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什么“全左”、“斗绝了”、“乱了套”，是什么“制造矛盾”、“制造分裂”，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为此，他还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到处搜罗反辩证法的破烂，什么“无合二而一”就“无统一观念”啦，什么辩证法是“黑话”“半黑话”啦，什么“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啦，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啦，……这些在他灵魂深处爆发的屁话，充分暴露了这个色厉内荏的反革命小丑对革命辩证法的恐惧和仇恨，暴露了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的大党阀、大军阀梦想篡改党的理论基础的反革命阴谋。

× × ×

历史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孔老二炮制中庸之道，妄图调和矛盾，否认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结果，奴隶社会历史地被封建社会所代替，孔老二落了个“丧家之狗”的下场；林彪步孔老二的后尘，妄图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开历史的倒车，搞反革命复辟，终于以“天马行空”，自取灭亡而告终。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判决。